

# 论儒释道对徽商的影响

李 珍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古徽州自南宋以来素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是中华文化正宗传承的典型地域。徽商自小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并以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徽商不仅经济基础雄厚,而且造就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充分体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映射出释家和道家思想的光芒。本文拟就儒释道在徽州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徽商的影响作详细分析,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徽商的文化理念。

关键词:儒释道 徽商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清之际,受社会大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徽商文化理念,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但近年来,在徽商价值观的研究成果中,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徽商的儒学思想,而对于徽商的道佛信仰则关注甚少,这就难免让人产生徽商文化理念单一的误解。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儒释道在徽州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徽商的影响作详细分析,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徽商的文化理念。

## 一 徽商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

### (一)儒学思想熏陶下的徽商

作为中华主流文化的儒学,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一地域,并与当地文化结合,产生了以儒学为指导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由中原等外地迁入徽州的移民,或为世家大族,或为缙绅冠带,亦有文人名士及黎民百姓,他们大多举族而来,迁入徽州后,又以自己的始祖或始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最著,支祠以数千计”<sup>[1]</sup>。各族不仅有族产义田,恤族助学,表彰义行,而且均有宗祠统之,岁时祭祀,聚会有期。尤其是徽州的名族,“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世年系,

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sup>[2]</sup>。

徽商的崛起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宗族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宗族中“凡官有余禄”或“商有余资”者,往往拿出来资助同族子弟业贾。他们或贷款给经商的同族子弟而“不则其息”,或将资金委托族人代贾,或附资让同族商人经营。依靠遗产或乡党族友集资经商的,资本较为雄厚,经营规模也较大。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还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等。据陈联统计,此类机构“共有一百余处,其数量居当时府县级会馆等设施的首位”<sup>[3]</sup>。徽商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的优势。

### (二)道佛思想影响下的徽商

明清时期,道教被束缚于君主集权制度之下,其教义、教制总体来说虽无大的发展,但其思想却进一步通俗化,流传于广大社会。佛教由于是外来文化,为解决本土化的问题,自传入东土伊始,便存在着与下层民俗文化合流的趋势。至明清时期,佛教已经极度的世俗化,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市

镇村集都有僧尼出没,僧寺兴修、信佛念佛之人也是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并对人们的生活行为模式产生着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对于宗法制度森严的徽州,究竟有没有受到道佛的影响,世人观点不一。比如许承尧记曰:“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sup>[4]</sup>而高寿仙则指出:“有些受儒家文化浸染较深,或者说彻底‘儒教化’了的人曾试图削弱佛、道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如曾‘选宗之贤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的明代休宁商人程镶临终就曾谆谆告诫子孙‘毋作佛事’。但他们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人们普遍将信佛拜神视为祈福免灾的主要手段之一。”<sup>[5]</sup>此外,周晓光、李琳琦及叶显恩等认为道佛在徽州虽有所发展,但影响较小,“理学渗透徽州社会、政教、风俗等各个方面。异端邪教很少掺入徽州;释道等宗教虽也掺入徽州,但其影响有限”<sup>[6]</sup>。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释、道究竟对徽州产生了何种影响呢?我们知道,明清两朝统治者在推崇道佛的同时,在各个方面都加强了对二者的控制,“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给度牒,及民间子弟户内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号一个月,并罪坐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举者,各罢职还俗”<sup>[7]</sup>。但这种严格的控制并没有对道佛的发展产生实质性改变,反而更促使其进一步世俗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民风民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谓“自古名山僧占多”,云游四方的传教人士,因徽州山清水秀,故在此驻足,或立寺,或建观。而且,迁入徽州的一部分人因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避世心态,这必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徽州人的性格,造就了特立独行的做派,影响着徽州文化。那些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久滞逆旅、远别家乡,人地生疏、祸福难料,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充满了恐惧,不得不祈求于神灵,保佑自己在客地的经贸活动能够逢凶化吉、经营和顺,以摆脱内心处于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安定的恐慌状态。同时,封建官府对市场的具体运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商家无法定规则可循,不得不依靠道佛神灵的威慑力量来抑制市场竞争中存在的不正当行为,以“人神共愤”来规范市场竞争的秩序。比如王振忠曾在皖南收集到数百种徽州民间宗教科仪书,其中刊本《祈神奏格》中就有不少有关商业活动方面的宗教科仪。这种对神灵的敬畏及膜拜,使得分布各地的徽商每逢神生忌日便汇聚一堂,焚香祭拜,通过思乡之情将这种具

有地域性特征的商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徽商从根本上来说,尊崇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那种对于仕途的向往,对于成功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道德感和人情世故的平衡感,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但徽商在表面精进的同时,深埋在进取心之下的,还有另外一层思想,那就是对道佛的虔诚信仰。在崇儒的古徽州,道佛之所以能够立足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当时社会,尤其是徽州民俗的结果,具有浓厚的徽州地域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徽商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在本质上,三者又是相缠相生、互融互合的,共同维系着整个徽州文化的综合与协调发展。故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徽商的文化理念,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徽商文化及徽州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

## 二 儒释道对徽商和积极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并引起了传统道德观念、社会阶级构成及其生活方式的诸多变化。正是得益于这一松动的文化土壤,徽商迅速崛起,建立起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并体现其自身价值观的商人文化理念。以下,笔者拟通过对徽商的经营动机、经商手段及资本流向三个方面,来探讨这种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文化理念究竟是如何对徽商发生积极影响,又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并通过徽商来认识这一时代所造就的商人精神。

### (一)徽商“治生”的经营动机

明代中叶,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观念变化。一些进步思想家,如丘浚、王阳明、李贽、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开始对束缚中国工商业经济成长的封建生产关系展开批判,并对本末关系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见解。同时涌现出与传统的本末思想相对立的学派,如颜李学派便是具有强烈新兴市民意识的思想流派。该派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对工商业经济关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在经济伦理上对儒学作了很大的创新与发展。

在这一松动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商贾自身的价值观也突破了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的人生

模式与“重官轻商”的理念,转变为一种相对务实的意识。如明弘治、正德年间,歙商许大兴曰:“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sup>[8]</sup>尤其是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曾上疏曰:“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然而关市之征,不逾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sup>[9]</sup>并进一步阐述了商贾对国家的贡献:“今制:大司农岁入四百万,取给盐荚者什二三。淮海当转毂之枢,输五之一。诸贾外饷边,内充国,戮力以应度支,顾岁计率三五以为期。”<sup>[10]</sup>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社会人们所倡导的这种“士商异术而同志”、农商“交相重”的新价值观,并没有对传统的价值观给予全盘否定,而是对原有思想进行改造、变通和融合而产生的。所以,它很容易为传统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特别是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支持。当然,“治生”的价值取向之所以能够为徽人所接受,还在于他们生长的特殊地理环境。皖南古徽州,地势若高台城垒,陆路交通阻隔而又江河四射,山多田少而又物产丰富,为了谋求生计,许多人冲破传统“农本商末”的思想束缚,从事商贾之业。如顾炎武所言:“徽州保界山谷,土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粳,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栢,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sup>[11]</sup>

## (二)徽商“崇德”的经商手段

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崇德”意识一直是徽商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幼深受其熏陶的徽商,在经营过程中,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能够“贾名而儒行”。宗教一般是出世的,但并不能真正脱离俗世而存在,故任何宗教都有其追求俗世的一面,道教、佛教当然也不例外。基于世俗经济伦理,它们也形成了自身的经济思想,如道教的清静无为、重契受信,佛教的超然解脱、慈悲济世等,这些宗教化特征也都折射出超经济的内涵。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笔者仅就徽商经营

活动中的儒释道诚信观、义利观、用人观、市场观、人际观等作简要论述。

1、“以诚待人、以信接物”的品牌效应。诚信,一向为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学说所推崇,被视为“立人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徽商,在商业交往中是极其“重然诺,守信用”的,如婺源洪胜,“先生生平慎取与,重然诺,有季布风,商旅中往往藉一言以当质券”<sup>[12]</sup>。徽商洪辑五:“其为人也,轻货财,重然诺,义所当为,毅然为之,不挠于俗论,有古君子风。”<sup>[13]</sup>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留存徽州文献中俯拾皆是。如果说儒家的诚信观为徽商树立了道德上的规范,那么,道教“重契”的思想则为这一价值取向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在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加以保护,徽商在起落无常的生意场中,往往“歃血为盟,务宜苦乐均受,如匿私肥己,违犯此仪,神人共殛”<sup>[14]</sup>,以此来防范对方的侵欺、违约行为。这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情关系代之以契约的情形已较为普遍,这对凝聚众商、使徽商成为一支强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起到了夯实的作用。徽商的“诚信不欺”,为其赢得了源源不断的顾客,无论是朝廷官员、士人、百姓,还是其他经商者都愿与其交易,使其治生之业愈做愈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佛教“以人为终极关怀”理念在商业中的应用结果。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雪岩,他正是迎合人们关怀来世的心理,为“戒欺”这一商业精神披上“造福冥冥”、“善自为谋”的宗教外衣,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序言》中更以“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惊惧意识;把佛教“因果轮回”、“福祸报应”的教义运用到经营准则上,以此保证药品质量,销售地道药材。也正是因为秉承这种“戒欺”诚信,最终使得胡庆余堂的规模及影响程度远胜杭州“许广和”与“叶种德”两家老字号,一跃成为独步江南、闻名遐迩的大药店。

2、“重义尚利、义利并举”的双行规则。义与利的关系是经济伦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集中表达了人们对于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认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是重义轻利的。相较而言,道家在重义的同时,肯定了“利”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且道家论“义”,重在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而不在于君主一己之私<sup>[15]</sup>。同样,佛教虽追求解脱,但没有要求人完全舍弃世俗财富,而是教导人们如何选择“正业”,以恰当的方法去获取,节制有当。在徽州传统的社会心态中,人们重



义轻利,虽贫不言钱财。明清时期,由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而引发的社会变迁,加之受儒释道义利思想的影响,徽商形成了既重义又尚利的“义利统一”价值观。《黟县志》中就记载了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对义、利关系的阐述:“舒君遵刚,字济柔,号遂斋,道光黟县人……精椎算,善权衡,年未三十即能创业。然与市阍狡诈之习不类。尝语人曰:‘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君子言又曰:‘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有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sup>[16]</sup>在舒氏看来,无需讳言“生财”、“求利”,关键是要“取之有道”。何谓“有道”?就要如圣人所说,“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将义、利有机统一起来。在舒氏看来,钱就好比是“泉”,如果“因义用财”,不仅是流而不竭,而且能广开财源,收到赚利、发财之效。这从理论上论证了在经商中以义取利的必要性。

3、“知人善任、宽厚待人”的用人之道。徽商在初入商海时,大多以小本起家、独力经营,当其资本增殖、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后,多是选择若干人为己所用。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人事管理逐渐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徽商的商业人才观,究其来源,则是取材于儒道佛的“德才兼备”、“知人善任”、“各尽其才”、“宽厚待人”等思想。首先,徽商选人以德才为本,德是先决条件。因为有“德”之人,能在经营中“铢两不私”;能与人坦诚相处,建立起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能上下同心,“主宾倚重,相与有成”<sup>[17]</sup>。徽商的这种经营方式是儒家所强调整体性、团结性的思想在商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对增强商业经营中的凝聚力,扩大商业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徽商用人,采取放手使用、各尽其才的原则。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sup>[18]</sup>。老子所说的“道”,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懒汉式的“无所作为”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之有益”<sup>[19]</sup>、“无为,故无败”<sup>[20]</sup>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是“无不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徽商,尤其是富商大贾,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聘请代理人或副手来代替自己经营。如“(明末休宁人汪太学贾于芜湖)家大饶裕,太学不亲执管库,权子母息,出入各有司存,年终受成,人不敢以毫忽欺”<sup>[21]</sup>。还有些徽商只管大的经营策略的制订,

或坐镇总店,其余分店则择人分而治之。由此可见,徽商在用人方面,是放手、放权的,可谓深得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精髓。再次,在待人方面,徽商遵循着“宽厚”原则。佛教认为,善恶是从心里滋生出来的,人心的本性无善无恶,因一时之念所引起的真妄及其衍生的善恶均没有实性,“真赅妄本,妄彻真源”,由此善恶不过是真妄分别而导致的后果;善恶是可以转化的,去妄存真、弃恶从善是有内在根据的。那么,对于曾经违反过商业规则的员工不是简单摒弃,而是努力帮助教化。如徽商程君,他对手下之人,经营中偶有蚀亏的,也不予责罚,而是“宽之以务究其材”,让其吸取经验教训,在下一次的经营中再设法弥补。徽商王子承“诸弟诸子从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愿与之代兴,各致千万有差,无德色。即手拓家人产,鼎足分之”<sup>[22]</sup>。徽商这种“欲强之,必先与之;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做法有利于激发伙计的敬业和专注精神,无疑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市场策略。在经商者日众、竞争日趋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必须以知识、信息和预测为基础,准确地把握投资时机、投资目标,才能获利。如《道德经》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sup>[23]</sup>即是说,圣人如水一样,行动善于把握时机,做到“与时迁徙,应物变化”,此乃“动善时”也。这就要求管理者“行道”时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无为”),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无强”),而要“因自然以理事”、“遵天之道”、“从天之则”,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佛教《杂阿含经》亦云:“当观知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无常。正观无常已,色爱即除。色爱除已,心善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无常。”<sup>[24]</sup>意思是说世界万物时刻都处于变化之中,即所谓的“诸行无常”。对于商业来讲,市场环境、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等都时刻处于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这就要求从商者要将这种“诸行无常”的发展变化观运用到其经营管理当中,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以变应变、以变制变。徽商自幼读书明理,他们善于学习前代商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无敢居贵”,“择人而任时”等经营智慧,将其融入自身经营理念中,并加以积极实践。如“公字以瑞(明成化

嘉靖间歙人)……弱冠失父,无昆季,且患臂,挟微资往来江湖间,人罕见其走陆,又善相时投机,故遂致足”<sup>[25]</sup>。简言之,徽商经营行业与资本组合的多样性,反映了其在营商活动中具有极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而这正是他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

5、“方而不怪、圆而不滑”的交际技巧。儒、释、道三家都比较重视人际交往,但重视的程度与侧重点各有不同。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即是经济治世,其背后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性,是构成封建伦理学说的重要基础;佛教通过强调“众生平等”的思想来阐述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人际交往理论与实践;道教则更加侧重于“均等”思想,提出“清心寡欲”、“天人合一”、“济世利人”等为主要内容的人际交往观。受儒道佛三种人际观的影响,徽州的一些富商巨贾,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老村夫、贫困羸弱,他们都能与之相交往,这在族谱的“家规”、“家训”或“家典”中多有记载。如歙商黄节斋,在两淮经营盐业时,“居鹺场,窰灶不自存者周之,时有所贷,不责其偿”,又“好贤礼士,挥金不靳”、“君客淮阴日,淮阴当南北要冲之地,士大夫毅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尤注意计偕,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儒绅翕然称节斋”<sup>[26]</sup>。黄节斋所结交的,既有贫困的灶户,“寒素”的“计偕”(即入京考试的穷举人),又有车乘来往的士大夫。根据不同的社交对象,结合自身的长处,徽商以馈赠钱财、美色或联姻、自身的文化优势等社交手段,做到了“上下通达”。

综上所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商一直遵循着“崇德”的价值取向,他们以自己的诚信和勤奋开拓了商业之路。但没有一种财富是完全靠诚实而得来的,在徽商经营的过程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一些与道德伦理相悖,却可以带来经营效益的方针和策略,如上述的“囤积居奇”、“官商结合”等。事实上,商业手段和道德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融的东西少,并行的东西多,它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就如铁轨一样平行延伸。因此,两者在理念与方式上所造成的差别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们硬拧在一起。在很大意义上讲,徽商正是做到了这种诚信与“欺诈”的完美结合,才足以使他们能够“上通天子、下交布衣”,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简言之,他们成功塑造了“外美内奸”这一典型的商人形象。

### (三)徽商“家国天下”的资本再分配

儒家思想是一套以“仁”为核心,强调君臣、伦

常关系的学说。孔夫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同时,儒家又倡导“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sup>[27]</sup>。道教也认为,经济的最终意义在于其社会性,经营的最终目的乃在于济世,而非一己之私利。如:“有物无过错,富饶当施惠”<sup>[28]</sup>、“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sup>[29]</sup>、“人有财相通,施及往来”<sup>[30]</sup>。佛教的慈悲观念是与佛教的解脱论紧密相联的,慈悲是梵文Maitri-Karunna的意译,就是慈爱众生,施予快乐,悲悯众生,去除痛苦之意。

儒道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直接感化着徽商,他们往往出于政治上、道义上或社会心理上的原因,除将所获利润部分用于产业投资之外,大多则造福于桑梓或社会。他们在家乡和经商所到之处,慷慨捐钱用于兴办学堂、书院,置义学义田,延师课童,对子弟教育倾注了极大心血。教育的繁荣带来了科举的辉煌,徽州历代人才辈出,名人荟萃,“一科同郡两状元”、“一榜九进士”、“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兄弟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等,这不仅提升了家族的威望,也为其赢得了官场的保护伞。另外,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建筑、徽戏、徽菜等的繁荣发展也均是得益于徽商的扶持与资助。更重要的是,徽商在发展经商事业,促成教育和文化繁荣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铸和运用,将儒释道思想更加融会贯通于一体(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因此,致富后的徽商“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人于信义,不失仁风”,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繁荣了经济,而且还孜孜追求、不懈努力,为徽州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三 儒释道对徽商的消极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制度不管如何变更,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在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上。明清两朝统治者都大力尊崇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期冀以伦理纲常教化天下,抗衡商品经济对封建社会风尚造成的危害,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这也导致了人格的迂腐和社会的僵化。而同一时期,道佛在统治阶级的压制下,开始走向衰落,其教理教义日渐流于迷信化,严重毒害了人们的理智。儒释道对徽商的消极

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抑制了资本再生产。明清时期的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在流通领域纵横捭阖,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但徽商从来就是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且每个成员身上都浸透着封建文化的商帮。他们只能是认同、倾慕、遵循并且依赖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定等级制度,并且力求成为封建特权社会的受益者,或竭尽全力期图成为特权阶层中的组成部分。这种特定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徽商的剩余资本大多流向了非生产性领域。

第二,增强了商业依附度。在徽商的骨子里,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以农为本、以仕为尊”的传统思想,这种对儒业的崇慕和对入仕的向往,使得越来越多的徽人拼搏于科场功名,致使从商人数减少、素质下降。而且,徽商对儒业的向往和追求,也令他们失去了对近代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欲望。比如,“由商入儒”的乾隆朝进士程晋芳,其“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sup>[31]</sup>,但“耽于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铺卷其上,百事不理”<sup>[32]</sup>。由此可见,徽商“弃贾从儒”并教育子弟后代“儒而不贾”的本质动机,遏制了徽州商人的进取精神,直接影响到徽商贾事乃至明清商业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第三,禁锢了个人开拓欲。宗法制度并非徽州的特例,但由于徽州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使得徽州宗法制度较其他地方远为兴旺和完整。“三纲五常”、“中庸之道”、“修身养性”、“君子无争”、“读书做官”等伦理道德观念自成体系,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渗透到人的行为和骨子里。因此,以乡谊族谊宗亲为纽带走出本土的徽商,不仅未能冲破封建宗法的束缚,而且他们始终是封建宗法的有力维护者。

第四,迷失了科学理智性。明清时期,面对商场的日益举步维艰,徽商几乎到了凡事必祈的境地。如王振忠先生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档案中,《利家请神》、《利家请香火》两份科仪就是徽商出门前对神灵的祷告。此外,《祈神奏格》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商业活动的宗教科仪,如《请铺土地》、《江湖请神》、《营回谢神》、《酒家祈神》等等。不可否认,徽商对道佛的信仰,曾起着一定的积极效应,比如道教的契约意识、重利观念、疏财济世思想以及佛教的自利利他、慈悲为怀等,无论是对徽商的商业经营还是对徽商的处世为人都具有道德规范作用。然而,道佛教义日渐流于迷信化,严重毒害了人们的理智。更严重者,把许多鬼神观念,宗教

迷信渗透到医学中来,骗人钱财,害人性命,死伤无数,“服药求神仙,反被药所误”,造成巨大的社会恶果。

#### 四 结语

通过前文研究可见,面临着地少人多的生存危机,徽州人不仅在儒学经典中发掘到“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坚定了徽人“治生为先”价值理念的确立。加之,徽州丰富的自然物产、便捷的水利交通,这些都为徽人从商提供了“天时”与“地利”,使徽商得以迅速崛起。在经商实践中,明清商人的重利尚义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言义不言利的僵死道德的约束,勇于追逐商业利益,能够驾驭市场,提炼出了一套精湛的经营之道。在他们积累了雄厚资金的同时,也促进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客观而言,晚明的重商思潮虽然动摇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体商、恤商的措施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贾受压榨、商业受摧残的状态,但它们并不足以震塌或彻底改变封建传统观念。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徽商,也从来就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官本位思想一直深植他们的心底。如叶显恩所说:“徽商本来就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封建性特别浓厚,它是在明中叶以后,凭其封建特权,靠官府的庇护赚取高额利润的,而商业利润的不断封建化,又益使其三位一体更加巩固。”<sup>[33]</sup>历史进入近代,徽商固守传统不变,缺乏创新进取精神,结果一步一步落后于变化了的时代,盛极一时的徽商迅速走向了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正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或许回顾徽商的演变历程在使今人发出怀古感叹的同时,也不禁令人深省!

[1][11][12][13][16][17][21][25][26]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34、4、279、4、276~277、140、260、271、278页。

[2][4]许承尧撰,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事闲谭》第十八卷《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1年,第605、607页。

[3]陈联:《徽商会馆与徽商网络》,《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

[5]高寿仙:《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6]叶显恩:《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7]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3344~3345 页。
- [8]明·《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嘉靖六年稿本),转引自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学术月刊》1999 年第 10 期。
- [9][10][22]明·汪道昆:《太函集》,黄山书社 2004 年,第 1352、1368、369~370 页。
- [14]《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275 页。
- [15]《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05 页。
- [18][19][20][23]魏·王弼:《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 1986 年,第 21、27、39、4~5 页。
- [24]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杂阿含经》卷一,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第 13~14 页。
- [27]夏延章:《大学中庸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 页。
- [28]《化胡经》,转引自张树卿、张洋:《儒、释、道的商贸观比较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 [29][30]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242、307 页。
- [31]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 [32]袁枚:《小苍山房诗集》卷二十七,转引自冯剑辉:《明清徽商“脱贾入儒”研究——以歙县长龄郑氏为中心》,《黄山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 [33]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1 期。

##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on Hui Merchants

LI 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ancient Huizhou, locating in south of Anhui, had been known as “cheng-zhu’s ancestral home” and “southeastern zou lu(邹鲁)”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a typical area authentically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The Hui merchants were influenced unconsciously b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rm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pths of their thought, which had common concept belief, ethics, the etiquette custom and so on, built a kind of “cultur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a confirmed and willingly abided business practices system. The Hui merchants with its stro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Creat a unique Huizhou culture.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fully embodied the Chinese orthodox Confucian, as well as reflected the thought flam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This paper will giv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development in Huizhou and their impact on Hui merchants, so that we can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ideas of Hui merchant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ui Merchants; influence